

怀念黑土地上的女作家——白朗

◇ 杨德芬 陈临爱 吴 铮

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里,有一座掩映在苍松翠柏中的墓碑,那里峻刻着白朗(刘东平)的简介。似乎平平淡淡,却让来自黑龙江的瞻仰者们肃然起敬。

白朗曾深情地把自己比喻成一粒革命的种子,“是萌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,松花江是我的奶娘,抚育我成长的是党。”1912年秋,白朗出生于沈阳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,幼时家境殷实,品学兼优,18岁与丈夫罗烽完婚后从齐齐哈尔来到哈尔滨。翌年沈阳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。身在哈尔滨的白朗深感失乡之痛、国耻之辱,愤然与丈夫罗烽一道参加了由杨靖宇任会长的反日会,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和会址。夜以继日的奔波劳累使已怀有身孕的白朗极度虚弱,然而青春的活力和抗日的热情又让她兴奋异常。

1933年夏,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同志指派罗烽、金剑啸,与进步青年作家萧军、萧红等一起,在口伪官办的《大同报》创办了一个副刊,萧红为其取名《夜哨》,喻警惕敌人。白朗为《夜哨》撰写了大量文章,《祇是一条路》《叛逆的儿子》《惊栗的光圈》等,构思精巧,文笔雍容,运用隐喻、暗示、象征等艺术手法,针砭时弊,揭露黑暗,像点燃的火种播进人民的心田,博得读者喜爱,白朗从此成为东北文坛上著名的青年女作家。当年末,《夜哨》因刊登了日本兵在农村的兽行,引起敌人注意而强令停刊。一个月后,白朗和同志们经过努力,在《国际协报》上又创办了《文艺》周刊,白朗任主编。在发刊词《文艺的使命》一文中,白朗指出:“文学是不能规定目的的,因为有目的的文学,常是失去了文学的价值。但文学者他不能只是埋首在书斋里构思、设想,起码更应该推开窗户,睁开他的睡眠,和现实亲吻一下。”反对有目的的文学,主要是针对日伪统治为宣传他们制造的“王道乐土”“共存共荣”等有目的的文学而言的。《文艺》发表的诗歌、散文、译文等,不仅为东北抗日爱国人士开辟了一块园地,同时也培养发展了党的文艺队伍。萧红就是在白朗主编的《文艺》周刊上,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,从此开始踏上文坛从事文学创作的。这一时期东北的左翼革命文艺创作得到空前发展。

1934年6月,由于叛徒的出卖,罗烽在哈尔滨被日本宪兵逮捕,白朗拖着流产后虚弱的身体,四处奔走,变卖家产,筹措足够的款项后,终于买通了日本领事馆某官员,使罗烽被关押了近一年后无罪释放。然而,白色恐怖日益加重,罗烽随时都可能再次被捕。1935年7月,白朗和罗烽在朋友的掩护下逃离了哈尔滨,途经沈阳,与亲人匆匆见了一面,来到上海先寄居在萧军夫妇处,后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这期间,白朗仍笔耕不辍,散文屡出,揭露黑暗,鞭笞丑恶。发表了《沦陷前后》《女人的惩罚》等散文和诗歌。1937年“八一三”事件后,白朗踊跃参加了“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”向民众宣传抗战,为前方将士募捐,慰问难民和伤员,鼓舞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。然而白朗夫妇一直生活在贫困、流浪中。此时,战事愈加恶劣、严峻。1938年,他们由上海来到武汉,后又辗转到了重庆。届时,“文协”成立了“作家战地访问团”,白朗欣然前往,山重庆途经洛阳、西安转赴中条山前线,目睹了日寇践踏我河山的惨景,心在流泪。同时,为抗日战士浴血奋战、英勇杀敌的壮观场面而深深感动,这在她的小小说《我们十四个》《老夫妻》中有着生动的描述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,蒋介石背信弃义,继续与人民为敌,一大批在重庆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上了黑名单,罗烽也在其中,随时有遇害的可能。党组织决定将一部分作家、艺术家分批撤往革命圣地延安,罗烽、白朗多年的意愿终于实现。在延安,白朗夫妇不时与毛泽东来往,交流文学艺术方面的见解。1942年5月,白朗夫妇参加了著名的“延安文艺

座谈会”,同年冬,白朗调到《解放日报》副刊部任文艺编辑。在1943年后的一段日子里,因为罗烽写了一篇《还是杂文的时代》受到批判,又加上罗烽夫妇来自敌战区而被严格审查,怀疑他们逃离哈尔滨的那段历史。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无休止的逼供和上纲上线、乱扣帽子,给白朗的心头罩上无法拭去的烟霾,让她悲观甚至绝望,导致精神错乱。原本俏丽的面容变得痴呆麻木,因口腔溃疡,一口洁白的牙齿竟全部脱落,那时她才31岁。1944年夏,经过查证、核实、复审,组织上为白朗做了无政治问题的结论。1945年8月23日,白朗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9月,因工作需要白朗夫妇又回到了东北。

全国解放后,白朗的地位和名誉接踵而至: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;中国作家协会理事;全国妇联委员等职。抗美援朝中,她六次赴朝鲜访问和慰问伤员;1951年代表蔡畅、邓颖超参加国际妇联执行委员会工作;并先后参加了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、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、新德里亚洲作家代表大会等,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成绩卓著。此时的白朗十分幸福,是党和人民用博大的胸怀烘暖着她;此时的白朗十分感恩:是祖国的日益强大让她又焕发了青春和活力。白朗迎来了广阔的创作空间,以其细腻酣畅的笔触,表达着对祖国、人民和党深厚的爱。她用洁白无瑕的心灵,光明宽厚的胸臆,在文学的沃土上辛勤耕耘,作品颇丰。

正值白朗朝气蓬勃、创作丰盈的时候,1957年“反右”斗争开始。一时间,乌云密布,黑白颠倒,人人自危。“反党集团”之称种种,“舒(群)罗(烽)白(朗)反党小集团”也并入其中。于是,白朗夫妇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,贬至塞外煤城阜新煤矿接受劳动改造。正所谓“君子坦荡荡”,白朗自信地说:“肯定有那么一天,我仍然会肃立在党旗下面尽情高唱《国际歌》,党需要我的时候,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我的生命。”白朗是坚强的,虽然体弱多病,仍和矿工们一道参加多种重体力劳动,并构思、发表了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,如《温泉》《少织了一朵大红花》《在起跑线上》《人、物质、精神》等。1961年,白朗夫妇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,双双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。似乎云开雾散,日见笑脸,然而更大的风暴却又无情的向他们袭来。在“我的一张大字报”指引下,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腥风血雨的岁月啊!夭折了多少精英,派生了多少冤魂呢?先是罗烽被揪批斗,白朗也在劫难逃。蹲牛棚,关“集中营”,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。1969年,白朗在锦州“干校”劳动改造,一个造反派头头搞“逼供信”,不仅当众侮辱她,还反复抽打她的耳光,惨白的面颊上顷刻间留下道道血丝,白朗气急愤急,本已绷得很紧的神经,突然间爆裂了,她第二次精神分裂,犯了严重的精神病,从此与文坛无缘。在以后的生活里,白朗的病情反复发作,其凄惨的情景难以言表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化雨,白朗、罗烽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昭雪,恢复了党籍、政治名誉及原级别待遇,白朗的病情也逐渐好转。她试图拿起笔来却却夙愿,但严重受损的脑神经已无力支配手写功能。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,罗烽拄着手杖,白朗坐着轮椅进入会场。他们年近古稀,已是两鬓斑白半身残了。1994年2月7日10时30分,白朗平静、安详地长眠了,走完了她多难而又绚丽的一生,享年82周岁。

我们怀念白朗,不仅是为她掬一捧痛惜的泪水,也不仅是她在黑土地上撒下的滴滴血汗,更是为她白如玉、朗如坤的品格和节操。纯洁无瑕,浩然正气;一代精英,永垂史册。她不愧是党的好儿女,不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典范。